

建国四十年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价

社会发展和社会指标课题组

编者按：这是一篇实事求是的有据有理有说服力的分析文章，对于我们冷静地总结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在，把握将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特此推荐给想了解中国的真实国情的读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年，历尽艰辛，已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经过40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科学技术获得很大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其速度大大超过了前30年。为了科学地展示这40年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我们拟采用社会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对40年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和简要的分析。

社会指标体系是用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数量指标衡量监测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通过这些数量关系来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协调。并揭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剖析其原因。它具有描述、评价和预测的功能。过去按照传统的做法，反映发展的综合指标一般只用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或用单项指标来评价，而忽略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次我们从现行的数千个社会经济指标中，根据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参考了国内外已有的社会指标体系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和现有统计基础，筛选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社会指标41个，组成了社会指标体系，分成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五个子系统，各子系统可进行相互之间的横向比较，也可进行历年的纵向比较。这套指标体系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衡量标准，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又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所以，发挥人的积极性和潜力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因此41个社会发展指标中有33个指标是用人和劳动力计算的比率数。

指标体系的计算方法是使用较简便的加权平均指数法，根据每个指标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确定权数，先计算出41个指标的分项指数，乘以权数得出分类指数和综合指数，然后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以货币表现的指标，均扣除了价格上涨因素，使历年具有可比性。

指标分析

一、综合指标的分析。

为便于比较，将建国后36年分成两个时期。以1953—1978年这26年作为一个时期，以1979—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作为一个时期。两个时期的比较结果是：改革后10年无论是综合指标还是分类指标的增长速度都明显快于改革前26年的增长速度。综合指标

1952—1988年全国社会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单位	权数	绝对数			平均每年增长%		
			1952年	1978年	1988年	1953—1988 (36年)	1953—1978 (26年)	1979—1988 (10年)
综合指数(41个指标)		100				3.7	2.8	5.6
(一)社会结构(9个指标)		20				2.1	1.5	4.3
1.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3	14.4	15.8	20.9	1.0	0.4	2.8
2. 非农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比重	%	2	16.5	29.3	40.5	2.5	2.2	3.3
3. 脑力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比重	%	2	2.4	6.5	8.5	3.6	3.9	2.7
4. 第三产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比重	%	2	9.1	11.9	17.9	1.9	1.0	4.2
5. 享受社会保障者占就业人口比重	%	2	7.7	22.7	27.7	3.6	4.2	2.0
6. 城镇就业率	%	2	86.8	94.7	97.9	0.3	0.3	0.3
7. 社会投资占总投资比例①	%	2	7.6	4.3	10.0	0.8	-2.2	8.8
8. 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	%	3	1.8	2.0	2.5	0.9	0.4	2.3
9. 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	%	2	4.0	4.7	12.8	3.3	0.6	10.5
(二)人口素质(7个指标)		20				4.0	4.2	3.1
10. 人口自然增长率(逆指标)	%	3	20.0	12.0	14.2	1.0	0.6	-1.7
11. 平均预期寿命	岁	3	35⑤	68.2	69④	2.0	2.3	0.1
12. 婴儿死亡率(逆指标)	‰	3	139⑥	47	35	4.1	4.6	2.1
13.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	3	6.4⑦	25.0⑧	28.6④	6.4	7.9	2.7
14. 每万人口大学生人数	人	3	3.3	8.9	18.9	5.0	3.9	7.8
15. 每万人口拥有医生数	人	3	7.4	10.8	14.9	2.0	1.5	3.3
16. 每万职工中拥有自然科学人员	人	2	269	594	962	3.6	3.1	4.9
(三)经济效益(7个指标)		20				2.6	1.6	3.6
17. 人均国民收入⑨	元	5	125	339	721	5.0	3.9	7.8
18. 每百元国民收入的财政收入	元	2	31.2	37.2	22.4	-0.9	0.7	-5.0
19. 社会劳动生产率⑩	元	3	345	818	1465	4.1	3.4	6.0
20. 每吨能源消费生产的国民收入	元	3	15⑥	567	853	-1.6	-0.8	1.2
21. 企业资金利税率(全民)	%	3	25.4	18.3	14.5④	-1.6	-1.3	-2.6
22.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全民)	%	2	83.6	74.3	71.1	-0.4	-0.5	-0.4
23. 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	公斤	2	958	1037	1231	0.7	0.3	1.7
(四)生活质量(12个指标)		28				5.3	3.8	10.1
24. 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元	3	76	175	634	3.6	2.2	7.6

续表

指标名称	单 位	权 数	绝对数			平均每年增长%		
			1952年	1978年	1988年	1953—1988 (36年)	1953—1978 (26年)	1979—1988 (10年)
25.人均收入(住户调查)								
城镇职工家庭生活消费收入	元	2	235⑩	316	1119	2.6	0.8	6.5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2	73⑩	134	545	4.5	2.4	11.5
26.人均居住面积⑫	平方米	3	5.8	7.5	15.0	2.7	1.0	7.2
27.恩格尔系数(吃占消费支出%)	%	2	64.9⑩	65.9	53.4	0.6	-0.1	2.1
28.人均能源消费量⑬	公斤	2	91	598	845	6.4	7.5	3.5
29.10种耐用消费品占消费零售额比重⑭	%	2	0.5	3.6	15.2	9.9	7.9	15.5
30.平均每万人口有商业网点⑮	个	2	96	13	116	0.5	-7.4	24.5
31.平均每万人口有电话机	台	2	7	39	87	7.3	6.8	8.4
32.全民职工人均劳保费⑯	元	2	60	71	282	1.9	-0.2	7.7
33.平均每百人每天有报纸	份	2	0.8	3.7	5.2	5.3	6.1	3.5
34.人均储蓄余额(城镇)⑰	元	2	12	90	487	8.2	7.1	11.1
35.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 (逆指标)	%	2	99.6	100.7	118.5	-0.5	-0.1	-1.6
(五)社会秩序(6个指标) (逆指标)		12				0.8	-0.2	0.4
36.刑事案件立案率	1/万人	4	4.2	5.5	8.3	-1.9	-1.0	-4.0
37.青少年案犯占犯罪数比例	%	3	25.0	47.6⑱	74.4④	-3.1	-2.5	-5.4
38.治安案件发案率	1/万人	2	7.5⑵	9.8⑶	13.0	-1.6	-0.8	-9.0
39.交通事故死亡率⑲	1/万人			2.09	5.04			-8.4
40.工伤事故死亡率(全民)	%	3	0.36	0.20	0.09	3.9	2.3	8.3
41.火灾发生率⑳	1/10万			6.97	2.6			10.4

资料来源:根据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有关资料加工整理。

注: ①指文教卫生、科研社会福利投资 ②包括基建投资 ③逆指标用倒算法计算(以下同) ④为1986年数 ⑤为解放初期 ⑥为1954年 ⑦为1964年 ⑧为1982年 ⑨绝对数为1980年固定价,速度为可比价 ⑩绝对数为现价,速度为可比价 ⑪为1957年 ⑫为城乡加权平均数 ⑬包括生产和生活消费量 ⑭自行车缝纫机、收录机、手表、电扇、冰箱、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洗衣机。 ⑮包括零售商业、服务业、饮食业 ⑯估计数 ⑰1985年 ⑱缺1952年,未算入总指数中 ⑲1979年。

36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3.7%,前26年平均只有2.8%,改革10年平均为5.6%,比前26年平均增长速度快了一倍。

从分类指标看,除人口素质和社会秩序外,社会结构、生活质量、经济效益三类指标均是后10年快于前26年的递增速度。从横向比较的速度看,社会指标略快于经济指标的增长。36年平均经济效益每年增长2.6%,而其他四类社会指标增长3.9%,尤其是改革10年社会指标每年增长6%,大大快于经济效益平均每年增长3.6%的速度。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生活质量指标,36年平均每年增长5.3%,改革10年每年增长10.1%,超过前26年增长3.8%的6.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前26年还是改革10年,生活质量的增长速度均大大超过了经济效益的增长,尤其是改革10年生活质量是每年增长10.1%,超过经济效益每年增长3.6%的

.5个百分点,这两者速度差别过大,说明了生活质量提高的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增长,两者很不协调,反映了确实存在消费需求膨胀的现象。其次是社会秩序指数中除工伤事故死亡率有所好转外,其他社会治安指标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近10年社会治安指标上升较多,说明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稳定。

二、分类指标的分析:

1. 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优化社会结构是改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我们选择了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智力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出口结构等9个指标。社会结构36年综合指数每年平均为2.1%,主要是改革前26年由于僵化的体制和受“左”的影响,重经济、轻社会、先生产、后生活,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形成了社会与经济发展很不协调的畸形社会结构,致使26年平均每年仅增长1.5%,城市化速度缓慢,非农业人口的比例26年间几乎原地不动,第三产业发展缓慢,26年间仅从9.1%上升到11.9%,社会投资比例下降,出口萎缩。改革开放10年来,社会结构已逐步趋向合理化,平均每年递增速度由前26年的1.5%上升为4.3%,其中非农业人口比例由1978年的15.8%上升为20.9%,^①非农业劳动力比例也由29.3%上升为40.9%,标志着农业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了,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例也由1978年的11.9%上升到17.9%,用于文教卫生、科研、福利等方面的社会投资比例也由4.3%提高到10%,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4.7%上升到12.8%,标志着我国正向外向型经济发展,脑力劳动者比例也由6.5%上升到8.5%。在社会结构中发展较为缓慢的一是享受社会保障人数的复盖面比例上升缓慢,由1978年的22.7%上升为27.7%,至1988年底尚有72%的社会成员仍处于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这主要是98%的农民还缺乏安全保障措施,这对农业生产力的稳步发展和农村计划生育的推广是不利的。二是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30多年来一直在2%上下徘徊,至1988年仍只有2.5%,居世界100位之后,造成我国教育滞后于经济的局面,也是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总的来看,社会结构虽比以前有所改善,但距社会发展的要求差距仍很大,仍需进一步改善和优化。

2. 人口素质,人口素质的高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同时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程度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现选择了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等7个指标,人口素质的综合指数36年平均每年增长4%,前26年增长4.2%,快于改革后10年3.1%的速度,这是因为建国初期提高较快,到70年代已达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人口素质在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再继续提高,速度就缓慢了,另外如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这三项指标是社会指标中既反映人口素质,又反映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但这三个指标的提高都有一定限度,如平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8岁,平均每年提高1.3岁,属于恢复性质,从1978年的68.2岁提高到1987年的69岁,则速度明显减慢,平均每年只提高不到0.1岁;初中文化程度人口从1964年的6.4%提高到1982年25%,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而近5年每年只提高0.7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2年20%降为1978年的12%,1984年降到历史最低点10.8%,说明计划生育成效显著,但自1985年以来又有回升,到1988年已回升到14.2%,这是因计划生育有所放松和进入生育高峰期所致;每万人口中大学生、

^① 反映城市化水平是用“非农业人口比例”,即以户籍制度来划分,未用“城镇人口比例”,因城镇人口包括了大量农业人口,1988年占63%,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水平。但在非农业人口中未包括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业人口800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8%左右。

医生和科技人员比例三个指标，后10年的增长均快于前26年的增长。总的看，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我们今后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 经济效益。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因此广义的社会发展应包括经济发展，经济是一切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过去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是片面的，如果单纯用社会指标而忽视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全面的。但经济指标繁多，我们选择了最能概括反映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水平和体现经济效益的7个指标，36年平均增长率为2.6%，改革10年平均增长3.6%，大大快于前26年平均1.6%的速度。经济指标中最能全面概括人的生产活动应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它包括了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价值，由于缺少1952年资料，故我们改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它反映每人在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也大致能综合反映国民经济总的发展水平，并考虑了人口因素，按可比价格计算，它从1952年的126元增加到1988年721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已达1081元。35年平均每年增长5%，改革10年每年增长7.8%，不仅快于各个历史时期、快于前26年3.9%的一倍，这个指标可以概括说明改革1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平均每个社会劳动者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其增长速度略低于人均国民收入，发展趋势大致相同；其他四个效益指标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如每百元国民收入相应的财政收入，是反映国家能集中和分配的国民收入中的部分资金。由于财政收入近10年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因此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由1978年的37.2元降为22.4元，还低于1952年的31.2元，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国家能掌握的资金比例降低了。而财政支出却增多了，以致10年中有9年出现了财政赤字，累计达670多亿元。每吨能源消费生产的国民收入是反映能源利用效益指标，工业化初期，由于现代化耗能企业少，因此能源消耗较低，1953年每吨能源国民收入达1506元，1978年降至567元，近10年能源利用率逐年提高，1988年又回升到853元，10年平均增长1.2%。资金利税率是综合反映全民企业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历年下降幅度较大，由1952年的25.4%降为1987年的14.5%，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是反映投资效果的，由于基建规模大、战线长，投资效果也是下降的，从“一五”时期的84%降为1988年的71%。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这一指标的选择是考虑到我国是8亿农业人口的大国，粮食仍是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粮食产量在近10年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加上农业劳动力增长过快，因此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增长缓慢，1988年只有1231公斤，近10年每年仅增长1.7%，稍快于前26年每年增长0.3%的速度，36年平均每年增长0.7%。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还满足不了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长缓慢或下降，所以总的经济效益不佳，这说明单纯求速度，忽视效益的倾向，还没到得根本扭转。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经济效益的增长慢于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的增长，已出现了不协调现象。

4. 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一方面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结果，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程度，另一方面，生活质量的提高又能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必须与经济效益相适应，只有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生活质量才能有物质保证。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很多，我们选择了12个主要指标，包括居民消费、收入、吃、住、用、能源消费、生活方便程度、精神生活和物价指数等。收入和消费等货币指标均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而具有可比性。生活质量综合指数36年平均增长5.3%，它是各类指标中增长最快的一类，尤其是改革10年，每年增长高达10.1%，比前26年的3.8%增加了6.3个百分点，增长较快的原因，一

方面是前26年因忽视人民生活,提高较慢,1978年以后头几年具有还欠帐的性质,此外,也确实存在消费增长过快和超前消费的现象。例如后10年居民消费水平超过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13个指标中10年平均增长最快的是10种耐用消费品占消费品比例(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电扇、照相机、录音机)每年增长15.5%,每万人口拥有商业网点每年增长24.5%,这一指标反映了个体摊点增多,居民生活方便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城镇人均储蓄额(11.1%),农民人均纯收入(11.5%)增长都较快。影响生活质量提高并出现负增长的是物价指数,在1978年以前,物价处于相对稳定,从1988年开始比上年的上升率为18.5%,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副食品的价格1988年上升30.4%,价格的猛涨不仅影响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而且还因超过居民的承受能力引起居民的不满情绪。

生活环境也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改革以来,环境保护工作受到各级政府重视,从197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并加强了监测工作,在防治工业污染的“三废”处理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就总体而言,环境保护存在问题较多,当前工业污染还相当严重,已严重危害了居民的健康,据有关部门1989年公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有79%的居民饮用水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工业企业“三废”污染尤为严重。如果不引起重视,将会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但由于缺乏历年环保监测资料,难以作出历史评价。因此本指标体系中暂缺环保资料。

5. 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与安全是表明人们对社会关系和行为的调控能力,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安全,是生产和生活的保证。我们选择了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生率、青少年犯罪比例、交通事故死亡率、职工伤亡率、火灾发生率等六个指标,这些指标是衡量精神文明、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的主要标志。以上六个指标的综合指数是各类指标中速度最慢的,(因为是逆指标,以倒退指数表示,均为负增长)除工伤事故死亡率是下降趋势外,其他安全指标均是上升的趋势,如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1952年只有4.2件,1978年上升到5.5件,1988年上升到8.3件,由于各地统计不实,实际立案率远不止此数,据有关部门估计约在15件以上,已超过了1981年历史高峰期,青少年犯罪在全部犯罪案件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由1952年的25%上升到近几年的70%以上,大案要案的比例也由4%上升到24.5%,每万人治安案件发案率也由1985年的9.8件上升到13件。1978年以来交通事故逐年上升,死亡人数由1978年2.5万人增加到5.5万人,平均每万人口死亡率由2.09人上升到5.04人,其他城乡居民非正常死亡率近几年也高于1979年,只有职工伤亡事故死亡率比1978年有所下降,但乡镇企业的伤亡事故死亡率是上升趋势。火灾发生率也是下降的。从社会秩序总的情况看治安情况日趋恶化,居民安全感大大下降。

纵观建国后社会经济的历史动态比较,大部分指标都增长较快,尤其是改革10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现象,除上述分析中已指出的外,还有一些未列入本指标体系中而在警报指标体系中反映出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是1984年以来社会总的供求失衡,供需差额由1983年的200多亿元扩大为1988年的2200多亿元,基建投资压缩不力,消费需求膨胀,居民消费水平超过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集团购买力居高不下,财政补贴逐年增加,10年累计额高达4000亿元,财政入不敷出,赤字加大,10年有9年赤字,累计达670亿元,如包括内外债和地方财政结余抵消的赤字,实际赤字接近2000亿元,货币发行量比上年

的增发量由1978年的17亿上升到1988年的680亿,达到了历史高水平,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供应的比例很不协调,每元货币流通量相应的社会商品零售额由过去正常年份的8—9元降至1988年4.4元,是历史最低点,通货膨胀的结果是物价上涨,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18.5%,超过了1961年16.2%的最高点,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物价的猛涨使三分之一的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上半年在治理整顿中情况仍没有好转,零售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5.5%,失业率有上升趋势,消费需求居高不下,滥发钱物仍未得到有力控制,1989年上半年职工平均工资(包括奖金、津贴等)比1988年同期增长18.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工资下降5.9%,居民生活必需品库存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据财政部统计,上半年工业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比1988年同期下降26.7%,可比产品成本上升18.6%,上交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41.4%,亏损额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多,财政支大于收的状况没有改变。

此外社会分配不公的利益矛盾比较突出,虽然从城乡贫富差距总的平均数并不悬殊,但是部分高收入户和暴发户,他们人数虽不多,影响却极大,据有关部门统计,年纯收入万元以上的户有437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2%左右,其中百万富翁已有4000余家,而1988年全国城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仍有1亿人左右,不得温饱的特困户也仍有3000万人左右,贫富的悬殊形成了强烈的攀比效应,它将影响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

上述指标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人们对于客观发展结果的判断,一般表现为主观感受,即表现为人们对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主观评价往往受到每个人不同经济条件、文化、习俗及社会心理、政治态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当前各项政策和生活质量的满意度,是政府各项社会政策实施结果的反馈,用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是社会指标中测量居民对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的较普遍使用的方法,只有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才能全面评价社会发展的总成果。所以,这里再就主观评价指标做如下分析:

近年来各单位做了许多问卷调查,对当前的政治社会生活反映了不少意见。尤其在党风、物价、治安等方面意见比较集中。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对40个城市2800人的调查表明,对物价上涨不满的比例已由1987年10月占80%,上升到1988年的92%,社会指标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社会司1988年8月对1万名职工调查,对物价上涨不满比例已高达94%,1989年上半年《半月谈》3735份问卷调查中,认为“物价上涨幅度比上年涨得最猛时”“更大了”和“差不多”的比例占75%,这说明物价上涨已超过了居民承受能力。在1万名职工的问卷中在“会引起社会矛盾冲突”的7问中,第一位是“物价进一步上涨”,占64%;第二位是“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占35%;认为当前社会安全中最突出,占第一位是“贪污受贿”;认为政治生活中最急需解决的第一位问题是“党风不正和社会风气不良”;在个人生活中占第一位的是“收入太低”,占第二位的是“住房紧张”,第三位是“劳保福利太少”。在《半月谈》的调查人们当前最关心的占第一位(78%)是要求“从严治党、克服腐败现象”,在问及对“克服腐败现象”的看法时,有66%的人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有21%的人认为“问题越来越严重”。1989年对北京172名知名人士和退休的高层官员的调查中,也把“深化改革推进民主政治,消除腐败现象”列为中国当前最迫切问题中的第一位,第二位是“从各级官员着手,自上而下推行廉政制度建设”,第三位是“控制通货膨胀”。

此外,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深感忧虑和不安。据公安部公安研究所1988年12月在15个省市对1.5万城镇居民进行的“公众安全感”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安全感处于“一般偏

下”水平。这是通过对五项指标（社会治安的评价、自我感觉、深夜是否敢走夜路、女职工是否要接送、一人在家是否怕生人来访）的综合测评，安全感均不到50%。《半月谈》1989年上半年的问卷调查，对当前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认为有好转的只占20%，有80%的人认为是“老样子”和“更坏了”，许多人现在有“三怕”——出差不放心，怕遭抢劫；上班不放心，怕家里被偷盗；行路吊着心，怕出车祸。

以上几家问卷调查结果大致相同，当前群众最关切的问题是反对腐败、控制物价上涨、对社会分配不公表示不满和要求整顿社会治安。主观感受指标和客观统计指标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如人民生活，从客观指标看，改革10年增长速度很快，但问卷调查结果，群众却不够满意和很不满意，说明人们对改革的期望越来越高，对改革的满意度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主观感受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追求目标相比，总是会有差距的，但差距不应过大，如过大，就会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还因为自1988年以来，物价上涨过猛，确实抵消了居民所得一部分好处，从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情绪。

从以上所反映的情况看，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是相当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已出现了不协调现象，存在着一些不安定因素，但大部分群众对改革是抱有热切希望的，如果能在今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认真地整治腐败、抑制通货膨胀、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整顿治安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重振党的威信理顺民心，就能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巩固建设和改革的成果。

此外，从主观调查和客观统计指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由于主观调查真实地反映了民意，因此它反映社会和经济不协调的现象更为明显，问题更为突出，由此可见，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应该是客观统计调查、主观问卷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由于本文是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反映的是宏观数量关系，对有些问题未能作深入的分析，这就有待于建立专题指标体系来解决，例如要详细分析社会结构是否合理、生活质量的内在关系等就要在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的专题社会指标体系中去分析；对于社会发展中较敏感又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的分析，有必要建立一套警报指标体系，定出警戒线，通过对数据的动态分析及及时提出预警，以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早在60年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运用社会指标体系和警报（先兆）指标为社会发展服务，并已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我国，社会指标工作刚刚起步，还缺乏经验，我们只是力求以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作一些探索性的研究。社会指标是一把“尺子”，我们希望运用这把“尺子”能准确地、及时地测量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发现一些问题，促使我国的社会经济获得健康稳步的发展。

（本文是经过课题组集体讨论，由吴寒光教授、李培元同志在理论、方法上作指导和修改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朱庆芳整理

1989.8.8

责任编辑：王 颖